

政治观察 0306

[【频道手册】政治观察](#)

[中国宣传机器在新冠疫情中受挫](#)

[幸存者的责任](#)

[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

[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

[醜陋的人民日报系列頭條](#)

[图集精选](#)

[消息精选](#)

来源：[政治观察](#)

[镜像](#)

【频道手册】政治观察

[返回目录](#)

【频道简介】

#政治

【索引】

- 1.群组推荐
- 2.政治常识扫盲澄清言论自由的各种误区
- 3.1959拉萨
- 4.威权式法治
- 5.夹边沟记事
- 6.定西孤儿院纪事
- 7.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 8.陆犯焉识
- 9.特写性侵停经一名朝鲜女兵眼中的军营
- 10.慈善做了一门生意
- 11.EMUI10渲染分辨率缩水基本实锤
- 12.2020年，你认为最重要的人权斗争会在哪里？
- 13.“中国绝大部分公司会因为申请人是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彝...
- 14.世界人权宣言全文
- 15.读那么多书，就是要从中找出一个做人的道理，如果还不能勇敢地相...

16.<https://youtu.be/ExqqdUXXdgA>

17.我是包丽的朋友这18天从未停止前行

18.国际特赦组织中文 | 这十题，你得了多少分？

19.零八宪章全文



[原文](#)

[返回目录](#)

中国宣传机器在新冠疫情中受挫

[返回目录](#)



[欢迎点击此处

订阅新冠病毒疫情每日中文简报

，或发送邮件至*cn.letters@nytimes.com*加入订阅。]

疲惫不堪的医护人员因长时间佩戴护目镜和口罩而在脸上留下勒痕。剃光头的女性，呈现出一种奉献的姿态。在政府的办公地点捐赠毕生积蓄、不留名的退休老人。

在与无情的新冠疫情的对抗中，北京正面临数十年来政权合法性的最大挑战，而它还在沿用陈旧的政治宣传策略。为了让人们团结在北京的统治之下，官方媒体在智能手机和广播电视台大量炮制关于团结、牺牲的影像和故

事。他们甚至一度推出了名叫“江山娇”和“红旗漫”的卡通吉祥物，意在危机时期激起年轻人的爱国热情。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问题在于：这一次，它的效果并不好。

网络上，人们公开地批评官媒。他们严厉批评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依然缺乏像口罩这类基本物资的情况下，进行鼓吹个人牺牲的报道。他们强烈抵制江山娇、红旗漫。他们纷纷鄙夷女性剃光头的照片，质问这些女性是否自愿，以及为何没有男性剃光头的照片。

一篇批评博文的标题是：《丧事变喜事，不是疫情报道该有的姿势》。

23岁的北京居民黛西·赵（音）说，她曾经信任官方媒体。而现在，她对那些将8名试图警告新冠病毒威胁的医护人员贴上散布谣言者标签的报道感到愤怒。八名医护人员受到公开谴责的照片和视频在网上广为传播。

“官媒现在真不太相信了，”黛西·赵说。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日益精进的政治宣传机器一直在帮助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而现在它正面临一次最大的挑战。

政府迟迟没有公开新冠病毒的威胁，并且试图压制向全国人民发出警告的声音。这样一来，它就打破了自己与人民之间心照不宣的契约：以个体权利换取安全的承诺。

为了平息民愤，北京下定决心“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官方派出数百名记者前往武汉等地，大量炮制一线医护人员和公众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

中国的政治宣传工作者面临不少强大对手。中国人民看到，一名年轻女子在母亲的尸体被拉走时哭喊“妈妈！妈妈！”的影像；他们看到，一位女性在阳台敲自制的锣，泣求一张医院的床位；他们还看到，精疲力尽的护士崩溃嚎哭。

他们都看过李文亮医生的脸——他曾试图发出关于病毒的警告，最终因感染这种病毒离世。

这场危机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看到了强权政府之下让人不安的种种方面。让李医生这样的人封嘴，令他们看到了压制言论自由的危险。患者和医院在网上发出的令人揪心的求助，让他们看穿了一个表面无所不能的政府。

北京正竭尽全力夺回话语权。官方媒体持续地报道在政府办公室扔下捐款转身就走的人。有人汇总了41个“丢下就跑”的报道。

还有一些报道的是“妈妈刚过世”或“孩子刚出生”就加入前线的医护人员。它们听起来相互雷同。

另一些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西安的一家报纸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位护士刚出生的双胞胎宝宝问爸爸“妈妈干嘛去了”。这家报纸为此道歉，称之为编辑错误。另一家报纸写道，一名护士去了前线后，2014年起就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丈夫，每次听到她的名字就会微笑，“好像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做着一件伟大的事情”。这篇报道后来被删除。

在中国，人们普遍对一线医护工作者感到发自内心的钦佩。但官媒的报道并未揭示出许多医务人员缺少防护用具的事实。目前已有300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

“他们的牺牲应该被铭记，”在中国最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有用户这样写道，“我们应该做的是引以为戒，不再让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再次发生，而不是去标榜‘牺牲光荣’。”

邓学平，那位写下“丧事变喜事”博客的律师，提到了一件事。一个病人疫情期间从武汉一个方舱医院出院，新闻报道说，她很喜欢医院，住得还不想走了。

“武汉的许多病患正苦于无处收治，可是我们的电视镜头却偏偏对准了这样一名喜不自禁的出院患者，”邓先生写道，“把个别人的喜庆放大，把大多数人的愁苦遮掩，很难说这样的报道所呈现的就是疫情的真相。”

人们同样感到愤怒的，还有官媒对女性医务工作者剃光头的报道。在一段广为传播的视频中，来自西北省份甘肃一家医院的十几名女性工作者，在出发前往疫情中心武汉之前剃了光头，她们中有些人哭了。

这段视频引来网上的质疑：她们是被迫的吗？为什么男性不剃？甘肃省的这家医院回应说，这些女性是自愿的。

最让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机器受挫的是江山娇、红旗漫事件。上周，中共共青团推出了一对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姐弟卡通吉祥物，他们的名字出自毛泽东的一首诗，其中“江山”指代中华民族，“红旗”则是共产党党旗。

“快来给团属爱豆打call吧。”共青团在社交媒体上号召说。

人们没有打call。几小时后，共青团删除了帖子。评论者指责共青团试图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变为娱乐偶像与粉丝的关系。其中一条评论——“我是你的公民，不是你的粉丝”——获得超过5万点赞。

这种反弹也许表明了年轻一代对国家的一些新态度。

“这一个月年轻人在网路上阅读了大量一手资料和深度报道。”现年26岁在上海生活的史黛芬妮·夏（音）说。他们对于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感到愤怒与困惑，她说。

“年轻人的真实状态和官方以为的年轻人的真实状态之间是有距离的。”史黛芬妮·夏添了一句。

尽管质疑越来越多，共产党政府依然拥有广泛支持。其中占主体的虽是依赖官方媒体的年长者，但共产党依然期望得到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的撑腰，比如我在十月份写过的爱国青年的例子陆颖欣。

陆颖欣说，关于前线医务人员的牺牲和普通人向武汉捐款的报道，让她感动。她对李医生的去世感到难过，对警方指控他散布谣言感到不满。

尽管如此，她并不对政府感到失望。她解释说，政府现在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如果说我不信任政府，我又能做什么？”陆颖欣说，“我好像什么也做不了。”

在中国，缺乏评估公众情绪的科学手段。但她的态度可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是中国政府希望培养的态度。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北京在过去的几周加强了网络审查。社交媒体账号被删除或禁言。从周六开始，线上平台将受到新法规的约束，以确保更严厉的控制。

老一辈中有人担心，这次的疫情会被遗忘，就像中国许许多多其他悲剧一样。

“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小说家阎连科本月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说。



人们给李文亮医生守夜。李文亮试图对病毒提出警告，最终因感染离世。

“不能大声地讲，就做一个耳语者；”阎先生说，“不能做一个耳语者，就做一个有记性、记忆的沉默者……成为一个心里有坟墓的人。”

为了建造集体记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正将那些可能被删除的关于疫情的帖子、视频和媒体报道发到国外网络，建立数字档案。

一些年轻人已经是阎先生所说的“心里有坟墓的人”，而且想要确保更年轻的人也有这样的坟墓。

北京的黛西·赵说，在见证了疫情期间网上两极分化的话语之后，她决定以后从事教育职业。“关心世界，关心世界上的人。”她在一个微博帖上说。

史黛芬妮·夏因为发表疫情相关的帖子，微博账号被禁言30天。她说不管审查多严，她都决心继续发声，只有这样下一代人才能记住。

“尽你最大勇气去讲，”她说，“尽可能说话终归比什么都不说好。”

[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原文](#)

[返回目录](#)

幸存者的责任

[返回目录](#)

李文亮去世的夜晚，我指的是2月6日，我和很多人一样极为悲愤，在朋友圈激动地写了很多话。跨过午夜，像病毒一样传染开的悲伤突然被谎言截断，更多的人开始祈祷。继而，我们恍然，又被嘲弄了，怒火接连窜起。

第二天醒来，我不敢看手机，害怕那些怒火已经熄灭，害怕李文亮的离去只留下一地废墟，害怕我昨晚写的话今天看来徒然矫情。我被劫后余生的疲惫压垮，从今天开始，我们成了幸存者。

当然有人质疑，他们说李文亮不是吹哨者，第一个上报的人是张继先，他只是在微信群提醒了同僚；他们还说李文亮说的的确是谣言，因为用词不当，因为保密条款云云；他们又说李文亮自己没有想过要当吹哨人，请你们不要政治化他。

已经有朋友回应得很好：李文亮后来实名接受媒体采访，并提到“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他不会没有意识到可能的后果，但还是坚持了，这是难能可贵的道德勇气，也是他真正的吹哨时刻。

怎么理解李文亮和他的离去，关系到我们如何思考自己的处境。李文亮被训诫，被迫写下“明白”，是系统性瞒报的一个小小的环节，是构成巨大谎言的其中一个谎言。无法沙盘推演如果没有被训诫，如果没有瞒报，没有那么多感染者，李文亮是否可以得到更好的医护而逃过一劫，可以确定的是，谎言（训诫与瞒报），是系统的病症，它造成了无数本可避免的伤害。

李文亮作为谎言的双重意义上的受害者，无论是在微信群，还是后来接受媒体采访，都自觉承担了他作为公民的义务，他不是“普通人”，他是有所作为的受害者。我们，当然是幸存者。我们不是躲在一场自然灾害的中心，等风暴离境，就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我们是在被困在一个腐化的系统之中，充满人为的暴力，谎言，控制，利诱，威胁，在其中挣扎生存，也互相伤害。最勇敢的人死去了，最底层的人也死去了，余下的都是幸存者。

普利莫·莱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他终身活在羞愧之中：“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最优秀的人都死了，“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

李文亮离去之后，我因羞愧而极度沮丧——我应该做点什么，来抵抗吞噬我们的体制？我的工作是记录，某种意义上的见证者，我们这样的人，常常试图说服自己，保存荒诞年代的记忆，也是一项使命。但是我们中大多数人，至少我自己，显然不够勇敢。为什么不更大声说出来，为什么不多做一点，为什么不往前多走一步，为什么面对怪物怯懦了？

或者，更务实一点地讲，除夕夜，看着同行发回的种种悲惨消息，我难受不已，问自己：为什么你不在武汉？你是不是逃避了责任？我们都在系统之中，有的人在受苦，有的人却得以喘息。除了内疚，必须承认，其中还有作祟的虚荣心——我想当那个在场的见证者——一种齐泽克式的虚伪。

死亡的夜晚过后，我重复了一个朋友对马尔克斯的改动：恨在瘟疫蔓延时。不能原谅系统，这是我们被侮辱者、被损害者、被践踏者的伦理底线，是我们守住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的唯一方式，也是幸存者的责任。

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能分清谁是谁吗），大部分人都难以知晓、描述、理解系统的罪行。有很多辩解的理由，就像他们所不断重复的：发展下去将会解决这些暂时的问题；没有稳定的系统将会有更大伤害；外部敌人正在攻击。如果实在有无法掩盖的事故，也常常是“少数渎职者的错误”，而更多人只是“听命行事”。有时候受害者会被问：你又奉献了什么？

幸存者，因而才更有责任在此时的废墟之中，以最低限度的美德活下去，当不了英雄，至少仍保有人性。我想描述一下我理解的最低限度的美德，也是自我的要求。

李文亮之后，不该说谎。如果也不能说真话，至少应该沉默。如果哪一天我们连沉默也不被允许，至少不该举报他人，不该用谎言攻击他人。“谣言”这个词，应该被放弃使用，谣言是未经权威确证的消息，而系统正是权威。应该不厌其烦地讲述这样的“常识”。还有许多细微的事情应该坚持，比如，jingyao事件之后，不再在京东购买东西。

就像在奥斯维辛，那些跟你一样受折磨的人，总是首先折磨你的人。帮助他人也是幸存者的责任，不该去争夺少数人的特权，不该道德审判弱者，不该以凌辱他人来换取自己的优越。在此刻，口罩成了特权的象征，对它的拥有几乎可以简单把人群的阶级分层。应该尽可能地分给平凡的人，而

不是占有，抢夺。在其他的时刻，应该日复一日跟社会达尔文主义抗衡——人不是因为不努力而不幸，许多人终身劳碌依然凄惨，正视结构性暴力和剥削。

记忆，幸存者的最后责任。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他们的语言记忆，拒绝使用符合他们道德审美的词汇比如“正能量”，不哼唱他们的旋律，唾弃他们诗歌朗诵的韵律。不主动遵守他们的规则，比如不主动把水杯交给地铁安检员。不被系统异化，也是一种抵抗的方式。用我的身体和我的语言作为记忆的载体。剩下的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经验，我全部的故事，都属于我自己，也留给历史。



[原文](#)

[返回目录](#)

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 「川化」

[返回目录](#)



政治学、哲学

昨天 4:06

我的论文，“**Beaconism 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最近被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接收。刊物的排印版还没有出，我把预印本放在：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538736，大家可以免费下载阅读。

为了方便不习惯阅读英文论文的朋友，我在这里总结一下论文的来龙去脉。

1)

经常混中文互联网的朋友想必都已经注意到，自从2015年特朗普宣布参选美国总统之后，中国的“公知圈”便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川化（特朗普化）”潮流。这种“川化”至少有两类表现：

一类我称为“川粉化”——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未必认真同意特朗普的所有政策立场，但对特朗普本人的所谓能力视野胆识等等则顶礼膜拜，视之为深谋远虑且又手腕高超的一位不世出的政治家

（<https://matters.news/@linsantu/如何看待-特朗普看似疯癫实则极其聪明-或将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这种说法-zdpuApi3zBiWBAeNeQ4cA6h8CM9MQ32C4ZdugSuFUhuSoSVhv>）；

另一类我称为“川普化”——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或许心底鄙夷川普的某些言行举止，但相当支持他所代表的政策立场，或者至少乐于因为反对其反对者（经常被中国网民统称为“白左”）的立场而支持他的立场；

当然，还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是“川粉化”与“川普化”兼而有之。

有趣的是，“川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跨越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的传统意识形态分野的，无论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派”还是“反自由派”，“川化”者都大有人在（当然，同样也有不少“反川”者，只不过这些“反川”的声音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内，明显落于下风）。

“反自由派”一方（尤其其中的国家主义者、文化复古主义者）的“川化”，相对来说容易解释一些；就算是“强烈抗议”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某些党国辩护士，多多少少还是觉得他那种抛开“人权高于主权”的“白左理念”、专注于交易式（transactional）商战对抗的外交模式，对党国来说更加亲切、更加可以理解，因此多少有些“棋逢对手”、“英雄惜英雄”的味道。

但是“自由派”一方的普遍“川化”，解释起来就要费点工夫；毕竟特朗普的诸多言论与政策，无不与一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理念（人权、宪政、法治、民主等等）格格不入。所以尽管“中国自由派公知普遍挺川”一事在国内互联网上是公开的秘密，但在国外却很少有人谈及——最好玩的是，2016年我曾应某美国媒体之邀讨论了中国的几类川粉，最后登出的报道却把其中讨论“中国自由派川粉”的部分完全截掉；据记者后来转告，原来是美国编辑们认为这一现象太过于离奇、对美国读者来说太过不可思议和难以索解，为了避免过分烧脑起见干脆直接删去了事（见论文脚注1）。

2)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一类比较“大事化小”的推测（我在文中称为“pure tactic” explanations）是，这些自由派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川化”，而只是策略性地“挺川”——比如认为（或者说期待）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能够达成“倒逼中共改革”的效果，因此不必在意特朗普本人究竟是否关心中国人权、或者特朗普本身在美国内政方面是否一塌糊涂。

但这种推测并不符合事实，因为过去几年间中国诸多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特朗普的赞美实在是太过由衷、涉及的维度也远远超过对其对华贸易战效应的期许。最常见的赞美，皆与特朗普“反政治正确”有关；其次还有一些涉及反移民、减税等等。所以中国自由派的“川化”绝不仅仅是策略性的，而是确确实实有一个“（内）化”的过程。

3)

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我在文中称为“neoliberal affinity” explanation）是，自由派“川化”实际上反映的是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各国“新自由主义同盟”内部保守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对自由至上主义的劫持与吞噬。

但这种推测其实并没有真正解释中国自由派内部变化的动力机制——与欧美等民主国家不同，中国缺乏右翼保守选民通过选票压力逼迫新自由主义同盟政客就范的制度机制（比如在美国，许多共和党政客私下对特朗普颇有怨言，但畏于党内“川粉”选民与初选挑战者的压力，因此在公开场合中只能声嘶力竭甘为特朗普辩护；参见

<http://dikaioslin.blogspot.com/2016/06/Trump-GOP-contemporary-American-right-wing-extremisms.html>）；缺少了选举压力这一环后，仅靠“同盟”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并不足以说明这种变化如何作用于在公共论述场域中扮演独特角色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即便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拥抱过去几十年里根/撒切尔式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拥抱本身

也是需要（和他们后来的“川化”）一同被解释的现象。

4)

我自己对“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川化”现象的解释，一言以蔽之：“灯塔主义（beaconism）”。这种“灯塔主义情结”，更具体而言，又可以分成两个维度：

一是“政治灯塔主义”

——大体而言，即中国自由派出于对毛式极权主义的惨痛记忆、以及对习式再极权化的恐惧，而对西方（尤其是经济体量上唯一堪与中国抗衡的美国）政治产生一种殷切的投射，并且不由自主地将纷繁复杂的政治议题坍缩到自己有过切身体验的简化版“左/右”光谱上来理解。

由于这种投射与想象，使得中国自由派难以接受西方“白左”们对当代欧美政治“辉格史叙事”的否定与系统性反思（比如

<https://matters.news/@linsantu/种族隔离阴霾下的罗斯福新政-被挟持的宪政转型及其后果->

zdpuAr4nhqe9b3SqVUNmixftTVqJQsRDFzsWBvhbQKyAsSKVo）、对抗争性政治的重新采用（比如Black Lives Matter这样的大规模抗议）、对复杂政治议题重新探索平衡点的尝试（比如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寻找“政治正确”的空间，参见：<https://matters.news/@linsantu/林三土-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c讲坛->

zdpuAuGsPLujerTDRxaaJiV7QYbqsLqGpzSYkHJvnK46xfGKp）。

中国自由派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偏好，同样也与这种投射有关——过往计划经济的恶果刻骨铭心，因此对任何监管或调节市场的做法均抱有深切怀疑。

所有这些投射，在过去几年国内政治气候恶化的背景下，也愈来愈形成对“白左”们“怒其不争”的忿恨，觉得希拉里奥巴马默克尔们太专注于“自我批评”、面对崛起的中国这一“邪恶政权”太过绥靖；所以当有特朗普这样一个看起来像是要“砸烂一切旧秩序”的混不吝横空出世时，对他的热爱便是发自内心、而不仅仅是策略式的“可资利用”了。

二是“文明灯塔主义”

——不仅仅是憧憬“西方政治”，而且是憧憬更广义的“西方（白人/基督教）文明”，并因此忧心忡忡于后者将（因为生育率差距而）逐渐“沦陷”于

非白人移民/穆斯林难民/.....等等之手。

就这点而言，“川化”的中国自由派们与不少醉心于“大国崛起”的反自由派知识分子形成有趣的对位——后者实际上秉持的是一种“文明正名（挽尊？）主义”【注】的叙事，即通过“大国崛起”、“中国模式”的对内成功与对外输出，来为清末以来的屈辱扳回一城，（重新）坐到“世界霸主”的宝座上。对于“大国崛起派”来说，“西方文明”是心目中的劲敌，第三世界（尤其“穆斯林文明”）则是被霸主统治的对象与拖后腿的破坏者，所以一面对于“西方文明的衰败”有“惺惺相惜”之感，一面也通过这种心态来为国内镇压穆斯林少数民族来寻找借口。

【注】我在论文里用的英文是civilizational vindicativism，还没想好一个合适的中文词来翻译“vindicativism”——“正名主义”似有歧义，“挽尊主义”的精气神又不太对应；欢迎大家集思广益，给我提建议。

回溯历史的话，可以发现“文明灯塔主义”与“文明正名主义”同出一源，都和清末输入的“科学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密切相关；这种历史关联，也构成了当代“自由派川粉”与“反自由派川粉”同声共气的草蛇灰线。

5)

最后，有人可能会觉得，中国自由派的“川化”，根本上应该归咎于当代中国舆论场域的生态恶化——如果不是受了假新闻的蒙蔽，中国自由派就不会挺川。

诚然，这种生态恶化确实对“川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在论文最后一部分提到了这些因素（但是由于字数限制，无法详细展开），比如中国互联网舆论场的审查机制、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的兴起、以及在这种扭曲的舆论生态中昌盛的假新闻制造业与搬运业等等。

但这些因素本身，无法解释中国自由派何以在不良信息场域中，会倾向于选择相信右翼假新闻而非左翼假新闻、或者为何右翼假新闻比左翼假新闻在知识分子圈内更有市场——归根结底，要解释这一点，还是要回到知识分子本身既有的某些偏见、焦虑、意识形态框架上，也就是回到（自由派的）“政治灯塔主义”与“文明灯塔主义”（以及非自由派的“文明正名主义”）心理机制上。

6)

这篇论文我从2015年开始构思（并且在这几年间不断得到诸多朋友的反馈，参见致谢部分），然则尘务经心、加上自己的拖延，因此直到去年才完稿投出。而今被刊物接收时，正值国内疫情严峻，我却来介绍自己的论文、谈论中国自由派内部的问题，可能有人会觉得不以为然，认为此时理应合力对政府追责、而非引起内部纠纷自乱阵脚吧。

但是我相信两方面的努力可以并行不悖；并且恰恰是因为当权者令人失望乃至绝望，因此更要尽力避免反对者一方在道路选择上的自甘堕落，否则万一真的到了有机会变革的一天，我们只能从“坏”与“更坏”之间二选一，那就为时晚矣。如何令中国自由主义正本清源、从“川化”的趋势中迷途知返，实在是我们现在亟需思考与行动的议题。

【论文下载地址：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538736】

【此外，你可能也会对我关于MeToo的论文（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463859）和关于同性婚姻的论文（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452156）感兴趣】

公共知识分子13自由主义13中国320美国30149

149

[原文](#)

[返回目录](#)

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

[返回目录](#)



2020年1月17日，如果你是一位来到武汉的游客，你不会想到，六天后，这座城市和她的900多万居民会断绝与外界的一切交通，被封锁在一场前所未有的病毒的阴霾里。

当时，你也许已经听到了一点零星的肺炎传闻，但如果你去查一下官方的通报，就会放下心来：1月3日以来，到现在整整15天了，这座城市没有发现一起新的感染病例，也没有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如果你再搜索一下相关消息，你也许会读到：1月14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徐建国告诉《科学》杂志：“疫情程度有限，如下周无新增病例或将结束。”你没有理由不放下心来：毕竟，谁也不会对传染性肺炎这样的事情掉以轻心，我们可是一个经历过“非典”的国家。

1月19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了“万家宴”。

接下来的事情，已经是我们每个人亲历的历史……

通报与现实的矛盾

，而且只生效了一天，第二天（1月16日），国家卫健委就把检测权力下放到了湖北CDC。

也就是说，如果确诊标准有问题，影响的也是15日之后的通报，而不是之

前。

1月15日之前，怎样确认病例？

1月15日之前，确认病例的方法经历了两个阶段。

I. 未找到病原之前：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第一个阶段是2019年12月26日到2020年1月7日，我国的医疗与疾病防控系统发现了这种新型肺炎，但还没有找到病原，暂时称其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在这段时期，确认病例的依据是：临床症状+胸部CT影像学特征+以及已知病毒的排查检测。依据这样的标准，1月5日，武汉卫健委对外公布，武汉市一共发现了59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的发病日期都是在12月12日至12月29日之间。

II. 确定病原之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1月8日，国家疾控中心宣布，初步认定新型冠状病毒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病原，并且已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病原体的确认使病例的病原学诊断成为可能。

1月10日，国家CDC完成了PCR诊断试剂的开发与测试，随即下发给武汉。

1月11日上午7点，武汉卫健委发布通报，宣布通过病原核酸检测，确认了4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同时宣布，“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之后，新增病例为零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月15日。）

也就是说，在1月15日国家卫健委规定只能通过基因测序来确诊之前，**武汉在确认病例方面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制约**：在收到PCR检测试剂之前，可以通过临床诊断+CT影像来发现病例；在有了试剂之后，核酸检测不仅被允许，而且也具备条件。

在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武汉卫健委在1月3-15日的整整13天里，一个新病例也没有发现**。

武汉卫健委在1月15日发布的一篇疫情问答里，还专门强调了这段时间的病例监测力度：“**我市进一步加强了病例监测和搜索工作，一方面继续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监测，另一方面在我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病例搜索，以便早期发现病例。**”

然而，病毒真的在这段时间突然隐匿，变得难以发现了吗？一线医生显然不这样看的。

武汉医生的忧虑

从元旦开始，符合症状的病例就在迅速增加，做CT诊断的放射科医生的感受最为直接。对此，财新做了很详细的报道：

从1月3日，李云华（湖北新华医院放射科医生，化名）就发现了三例肺部磨玻璃状CT报告单，类似病例每天增加，而且增加比例呈直线上升趋势。1月10日磨玻璃状病例增加到30个的时候，李云华就觉得事情不对劲了。虽说尚待严格的病毒检测，但李云华凭经验认为，“我从没见过增长这么快的病毒，每过几天翻一番，这个速度太骇人了。”李云华由此不再敢相信官方宣称的专家判断，各医院放射科医生之间会交流疑似病例数字，情况都很不乐观。 （财新）

1月3日-17日，武汉卫健委通报与实际情况对比

1月	外部事件	武汉卫健委对外通报	实际情况	
			医务人员 新增确诊病例*	医务人员 发病人数**
1日		无通报		18
2日		无通报		
3日		通报：共计发现44例 “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4日		无通报		
5日		通报：共计发现59例 “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6日	武汉两会	无通报		
7日	武汉两会	无通报	1	
8日	武汉两会	无通报		
9日	武汉两会	无通报		
10日	武汉两会	无通报		
11日	湖北两会	通报：共发现4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1月3日后无新感染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 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233
12日	湖北两会	通报：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3日	湖北两会	通报：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3	
14日	湖北两会	通报：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5日	湖北两会	通报：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	
16日	湖北两会	通报：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	
17日	湖北两会	无通报		
18日		通报：1月16日新增4例	4	
19日	万家宴	通报：1月17日新增17例	9	
20日		通报：18-19日，2日内新增136例	3	

注释：

*医护人员确诊病例，数据由《第一财经》根据字节跳动医务人员人道救助基金公示的医务人员疫情信息整理

**医护人员发病人数，数据来自中国疾控中心2月17日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新华医院离华南海鲜市场仅2公里，是最早收治新冠患者的医院。

刘力（武汉某三甲医院放射科医生，化名）则是从11日起不敢再相信官方通报。那一天，武汉卫健委通报，截止10日24时，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刘力说自己当时就傻了，他明知道武汉同济医院调到发热门诊支援的急诊科医生陆俊1月5日就出现了“无明显病因”的发热症状，右肺CT片有片状磨玻璃影。他重看从1月1日起的所有急诊查肺的CT诊断……只看斑片状磨玻璃的。刘力痛心地看到，从1月1日开始，先是个位数的增加，然后逐渐开始翻倍，“到1月15日的时候，我发现了50例。可是到这一天，卫健委还在报原来的41个。1例没有增加。”（财新）

就这样，整整15天在官方通报里“销声匿迹”的病毒，在现实中却不断地蔓延。它随着求诊的病人来到了医院，盘踞在医院，袭击着医生、护士和病人，再随着交叉感染的病人们走出医院，扩散到武汉的大街小巷。

专家知道吗？

王广发：“当时，给我们的资料是41例确诊病例。”

王广发是国家卫健委派出的第二批专家组的成员，他1月8日抵达武汉，16日返回北京。17日出现感染症状，21日确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30日治愈出院。他因为在1月1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整体疫情“可防可控”，“没有出现医护人员感染”，所以在社交媒体上被一些网民指责不实事求是。

2月1日，他接受了中青报的采访。被问及“人传人”证据时，他回答说：当时的资料比较有限，“给我们的资料是41例确诊病例”，从有限的资料来看，当时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原始的资料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没有拿到，判断上就会失误。”



王广发感染新冠病毒，成功治愈后接受记者采访。

不难听出，王广发所在的专家组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医务人员感染的信息。

王广发在武汉工作的时间是1月8-15日，就在他停留的这段时间里，陆俊医生10日入院，李文亮医生12日入院，新华医院11日发现了第二例医务人员感染。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14名医护人员被同一个病人感染，而且就在王广发返回北京的同一天（16日），这14名医务人员被收治入院。“当时一回到北京，专家组就马上开会。我那时还没有发烧，也不知道医务人员感染、人传人的情况。”

不仅王广发，当时也在武汉指导防疫工作的中国CDC副主任冯子健对医务人员感染的消息也一无所知（《中国新闻周刊》）。冯子健后来接受《新京报》的采访，被问及何时得知医务人员感染的消息时，他回答说：大约是在19、20日，钟南山抵达武汉之后才知道的。

一方面，病毒在迅速传播，人传人迹象在一一线医生眼中显现无疑；而另一方面，专家们却只掌握1月3日之前的病例。

在没有获得新增病例报告、不掌握医护人员感染信息的情况下，专家组组

长徐建国的乐观态度就显得可以理解：“疫情程度有限，如下周无新增病例或将结束。”专家们在对待“人传人”这个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也显得无可厚非。这甚至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卫健委下发的第一版《诊疗方案》会把确诊标准定得仿佛很“苛刻”：将样本送至中国CDC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以专家当时掌握的信息来看，疫情并不紧迫，也不严重（只有41例，而且已经有10多天未发现新病例了）。既然现实威胁并不大，那么面对这个新出现的病毒，专家组愿意按照更严格的标准，以免出现“错分”，干扰研究的进行——这样的考量完全在情理之中。

有人质疑：既然专家到了武汉，也去了一线，为什么没有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是不是专家太“官僚作风”了？而王广发解释说，他作为医生在一线时，看的是一个一个的个案。也就是说，专家对疫情的整体把握，单靠个人亲历的视点是不足的，必然依赖相关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

社交媒体上有人指出，中国CDC是国家卫健委下属的公益事业单位，并没有行政权力。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成员有的来自CDC，有的来自其他医疗机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进行实地调研的研究人员，虽然是国家级专家，但跟当地的对口部门之间，并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他们要开展工作，其实非常依赖当地有关部门的“安排”和“配合”。所以即便到了一线，他们的所见所闻，也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他们的研判和结论，也会严重地依赖当地提供的数据和资料。

不跟专家分享医护人员感染信息，在这个问题上，武汉卫健委很难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感染”病例的概念比较宽泛，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观察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都被视为感染病例，医务人员中出现任何感染迹象，无论是否确诊，都应及时向专家组通报，进行重点讨论和研究。然而从多方面的报道看来，在钟南山率队抵达武汉之前，医护人员感染的消息似乎被严格地封锁了起来，甚至连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和中国CDC有关负责人都不知情。

“我在SARS10周年时写道，盖子不能捂，越捂越糟糕。对大众也不能隐瞒……绝对不能掩盖疫情，让专业人员都无法了解真实的情况。”（王广发）

武汉市长知道吗？

1月31日，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白岩松连线了当时仍然在任的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节目里，马国强回顾了疫情防控早期错过的重要节点：“1月12日、13日，又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随着病例数的增加，特别

是泰国曝出第一例从武汉去旅游的人确诊之后，我们采取了机场测温、高铁站测温等措施。”

从中我们不难听出，在1月12、13日的时候，武汉政府其实掌握了“病例增加”的信息，与此同时，武汉卫健委却仍然每天在官网上通报：没有新增病例。

在马国强与白岩松对话的前几天，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了央视的采访，在谈到武汉市前期疫情披露不及时的问题时，周先旺解释说：对于传染病信息的发布，地方政府必须要获得授权之后，才能依法披露，请大家理解。



这样的回答，一方面意味着，武汉地方政府掌握的信息比发布的信息要多；而另一方面又撞上了罗生门：疫情发布不及时究竟是哪一级政府的责任？武汉市政府究竟将什么样疫情信息进行了上报？是上报信息不完整，还是上级部门不允许发布？如果医护人员感染这个盖子，要等到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18日到达武汉之后才能揭开。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让人疑窦丛生。

政府综合考虑疫病防控与社会安定，对疫情信息发布采取谨慎态度，本也无可厚非，但整体上应该遵循“外松内紧”的原则：对外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对内则应该高度重视，做到决策者、疾控部门与专业人士之间信息透明，决策者应该在专业人士的协助下，制定有效的监测和防控方案，部署、协调各个部门加以实施。

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不仅需要专业人士的研判与建议，更需要决策者的智慧与担当，需要整个行政系统团结一致、周密部署、行动果断。然而就在决策者迟疑、防控部署松弛的十几天里，病毒畅行无阻，在人们就诊的医院里，在春节前密集的欢聚场合中，迅速蔓延。

1月19日，武汉百步亭社区的“万家宴”如期举行。

“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知道这个情况很严重，但大家都不敢说真话啊。”李云华说，“我们医护人员们没日没夜工作，就是想和死神赛跑，抢救病人，这些病人都跟我们同住一个城市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本不必遭受这么大的痛苦。”（财新）

失灵的网络直报系统

2003年SARS疫情以后，中央和地方投资7.3亿建立了一套“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然而这个系统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却没有起到作用。

按照系统的设计，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将新发现的传染病病例录入系统，录入之后，中国CDC和该院所属的各级CDC都可以立即看到病例信息。直报系统大大提高了传染病的监测效率，一个新病例出现，不需要层层上报，就能被中国CDC直接掌握。直报系统不仅提供了39种国家法定传染病的上报通道，还有一个通道可以专门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然而，武汉从发现第一例病例开始，一直到1月24日，整整28天，都没有使用这套系统。武汉采用了人工上报的方法，由医院通过口头、电话、邮件等方式报告给区一级卫健委和CDC，然后再经过市、省，逐级上报给中国CDC。这种操作让疫情监测效率瞬间退回到了2003年的非典时代。不仅如此，整个上报过程中，职责不明、衔接不清、时间拖延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导致很多病例漏报、延报。这些状况，让中国CDC掌握的疫情信息不仅是滞后的，而且是严重残缺的。（见《财经》报道）

中国CDC副主任冯子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被问及武汉当时为什么没有启用直报系统，他的回答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个新发疾病，在传染疾病报告目录里是没有的，调整网络直报系统设置、人员培训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回答令人费解。因为，直报系统专门为这类新出现的传染病病例提供了“不明原因肺炎”这样的通道，并不存在“目录里面没有”的情况。而冯子健并非不了解这个系统，他在2017年还专门就这个系统写过论文。那么我们就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作答？是为了掩饰中国CDC的责任吗？

中国CDC在这方面究竟有没有责任？

一个系统如果没有在使用，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系统的原因，系统出了问题，导致无法使用；另一方面是人的原因，该用的人不去用。在所有的报道中，没有人提及系统出故障的情况，所以，可以排除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该用的人没有去用，**武汉所有的医院都没有通过直报系统上报病例，为什么？**

有报道提到，直报系统使用起来比较复杂，而很多医生没有受过相应的培训，还有些医生甚至不知道有这个系统。也就是说，系统虽然建成了，但在很多地方都没有落到实处。直报系统在各地的有效使用，需要在当地卫健委的组织部署下，由当地CDC对医院感控科的人员进行培训，同时也需要当地卫健委对各个医院的系统使用情况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

由于我国的行政体系实行分级管理，所以各级CDC都是本级卫健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并不隶属于上一级CDC。就是说，武汉CDC的上级主管部门是武汉卫健委，而不是中国CDC。所以，武汉各医院没有使用直报系统，追究起来，其实是武汉卫健委的责任。

我们看到，直报系统的使用情况，各个地区之间也是有差异的。**1月15日，深圳就通过直报系统上报了第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财经》记者采访的上海一家医院感控科人员，对上报流程非常熟悉：“不管哪一科的医生，只要诊断出传染病，必须填写一张传染病报告卡，报医院防保科，由防保科上报CDC，不得有任何遗漏或者延误。”

中国CDC长期以来没有发现武汉在使用直报系统上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是有责任的。但主要责任，仍然在武汉市卫健委。所以，冯子健不能自圆其说的回答就让人不解：抛出一个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来“掩饰”其实并不属于中国CDC的责任——显得有些说不通。其中是否另有隐情？

武汉所有的医院都没使用直报系统？这一点有些匪夷所思。如果说武汉卫健委只是平时在这方面疏于管理，导致不少医院的操作有疏漏、不规范的话，表现出来的状况，应该是各家医院参差不齐，有的报，有的不报，有的报得准而全，有的报得马马虎虎；但是，几十家医院里面，没有一家医院使用直报系统，就值得额外注意：究竟是都不会用？还是都不许用？



经济学家华生，把这次疫情中的直报系统比作“马奇诺防线”：本以为固若金汤、一定可以拒病毒于千里之外的直报系统，竟然形同虚设，丝毫没有起到监测作用。

直报系统为什么被弃之不用，目前并没有看到很好的解释。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的事实会浮出水面，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

第一份“人传人”报告

从正规媒体的报道中，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人传人”证据书面报告并不来自武汉，也不来自国家卫健委前期派出的两批专家组，而是来自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袁国勇同时也担任港大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主管、港大深圳医院临床微生物及感染控制科主管。1月15日，他带领的团队在港大深圳医院确诊了一起家庭聚集性疫情案例。这个家庭的7位成员中，有6位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中有5位近期往返过武汉，1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人传人”特征，而且6位感染者之中，有1位没有表现出症状。

1月17日，袁国勇将这一发现以书面形式发送给了中国CDC主任高福本人和广东省CDC，提示人传人和无症状感染风险。

1月18日，钟南山率领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来到武汉。袁国勇也作为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一同到达，成为专家组中唯一一位来自香港的成员。

1月19日下午，钟南山院士结束武汉考察，对外发出预警。

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份来自武汉之外的报告，钟南山院士是否会在18日来到武汉，医护人员感染的消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向公众宣布。

不应沉默的真相

回溯疫情发展的这段时期（1月3-17日），人们对有关部门的通报没能如实反映真实状况、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疫情扩散感到愤慨，问责之声不绝于网络。

武汉有关部门最先的解释，是确诊标准妨碍了病例的确认速度，导致大量病例没有及时被确诊。（但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15日之前的零通报。）之后又有武汉市领导表示，地方政府只有获得了授权，才能发布疫情。随后又有领导表示：内心充满“内疚、愧疚、自责”，如果能“随着病例的增加”，在12、13日采取更严格的防控措施，事情应该会有所不同。

社交媒体上，也有评论者将矛头指向专家，指责专家不断地对外宣称没有发现人传人证据，误导了政府，误导了大众。

后来，官方和国家高级别专家组专家的一致回应是：“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一开始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因此需要一个加深对其了解的过程”。

然而，当我们越是了解一线医生在疫情早期的经历和感受，就越能够看到，这个“加深了解”的过程，是怎样被人为地拖长了：

“随着接诊越来越多的类似病人，越来越多的医生从临床看到不同寻常的肺部病毒感染，而且人传人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但多数医生们不敢公开发声，‘怕被警方传唤’。”“当初正是这份处理八名‘违法人员’的警方公告，犹如一道紧箍咒套住了众多医生。”（财新）

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任何政府、任何行政体系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但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开放的言论环境，当体制运转出现问题时，至少可以有一种纠偏机制，让问题更早暴露，引起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重视，更大的灾难也许就可以避免。

就这次疫情来说，一线医护人员是疫情早期最灵敏的触角，也是抗击疫情的最直接力量。发现疫情的是他们，战斗在一线的是他们，处境最危险的也是他们。但他们的声音却被严密地阻断了，最终导致医务人员成为这场灾难中付出了最大代价的群体。

李云华向财新记者透露，1月6日，新华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医生肺部CT显示有一小块阴影，呈现磨玻璃状，也没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当天院方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开会，不得把相关情况泄露给外界，尤其不能告诉媒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月20日。”李云华说。**医生病了，无人认账，显然有一种“指令”在起作用。**李云华透露，院方不仅不公开医务人员感染情况，甚至出台一条“奇葩规定”——本院医护人员CT检查，对于肺部不明原因肺炎待排除的，**CT片子及结果一律不给本人，由科室统一交给医院内部的感染管理科。**财新记者采访的武汉多位医生都透露，他们的医院也有类似规定——“检测结果不公开，阳性结果以电话通知”。（财新）

2月10日，湖北省卫健委主任和书记被双双免职。2月13日，湖北省委书
记、武汉市市委书记也被双双免职。这样的消息，似乎向大家提示了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所在。但社交媒体上，也有人为“免职”做了这样的注释：“免职只是意味被免职人不再担任原职务，一般不具有惩罚性。”2月13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记者问到，湖北两位高级别官员被免职，是否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崔大使回答：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这种人事调整是为了给予能者更多责任，也是重任。

随着疫情爆发、受控，又逐渐被遏制，早期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时的问题，仿佛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只有还原真相，只有真正了解究竟是什么让举国上下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我们才能汲取教训，避免未来的灾难发生。

疫情防控需要研判、决策和实施这几个环节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疫情从几十个病例，演变为今天这场波及全国的灾难，要分析其中原因，需要对这几个环节都加以考察。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公开讨论、争议、分析和采访报道，大都集中在研判部门，而研判部门作为一个“技术部门”，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部门和组织实施部门的指引、支持与配合。只有对研判、决策和实施这三个环节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我们才有可能还原事情原委，真正汲取教训。

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做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为拥有14亿人口的国

家，在这个高度依赖协同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已经远远不是一个比喻。如果没有信息透明机制让各部門相互协助、又接受監督，在危机面前，任何一处的失职、腐败、不作为，都会让整个系統付出昂贵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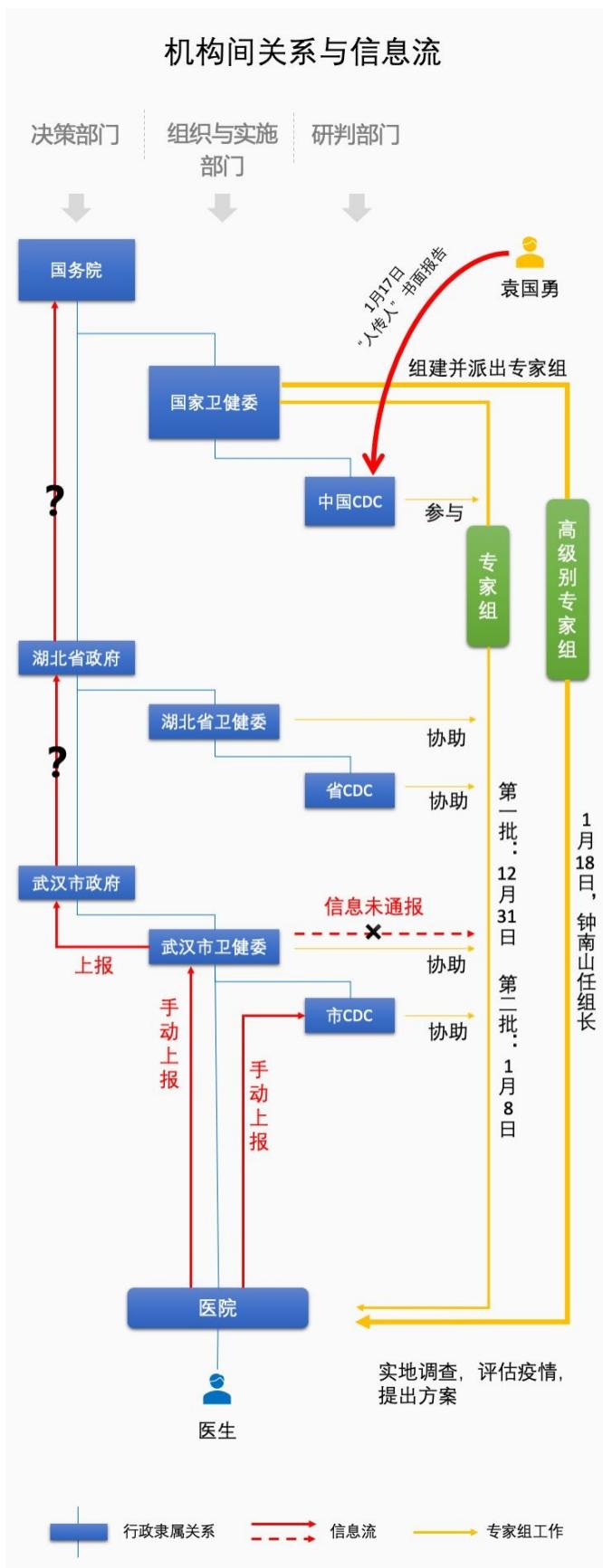
历史的哨音

2月7日晚上九点半，李文亮医生去世的第二个晚上，武汉市内响起了哨音和喊声，困守家中的人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这位去世的医生。

人们纪念的并不只是李文亮。李文亮让成百上千的“死亡病例”有了一张鲜明的面孔：一位80后，工作之余追剧逛街，爱吃炸鸡腿，一位丈夫，一位儿子，一位父亲，期待着即将到来的第二个宝宝，嫌爱乐维“好贵”。他就像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或者，他就像我们自己。

他是8位“造谣者”之一。人们为他感到不平：如果他的声音不被压制，也许疫情会在早期就被控制，也许事情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媒体也因此称他为“吹哨人”。

机构间关系与信息流



他就像一个缩影，一个黑色的悲剧寓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里，一步一步地提示着我们错过的每一个机会，每一个节点：12月30日，武汉错过了他的“哨音”。1月12日，当他重症入院的时候，正在调研的专家“错过”了他的病例。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一位医生正躺在ICU的病床上，心里在想：“通报怎么还在说没有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

但愿，千百位逝者付出了生命代价换来的教训，不会被我们最终错过。

2月7日晚上，当哨声和喊声在武汉城中响起的时候，也许，每个人心里都会闪过一些疑问：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让上千万人今晚在这里坐困围城？又究竟是在哪一个瞬间，李文亮医生和成百上千的人，不可挽回地与生的机会擦肩而过？

对这些问题的追索和回答，才是我们对逝者最诚挚的纪念，也是我们对生命的守护和祈愿。

翟鹏霄（微博ID：翟鹏霄）

2020年2月23日（修改于2月25日），上海

P.S. 写下这个日期的时候，方才意识到，武汉封城一个月了。

这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原文](#)

[返回目录](#)

醜陋的人民日報系列頭條

[返回目录](#)



注意，它刊登在「報眼」，和左側習近平視察軍隊的頭版頭條相比，處於「次重要」位置

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代表中共輿論導向。它在2020抗疫中的表現，為這種導向留下了無法塗改的歷史印記。

習近平2月3日披露，他在1月7日的常委會議上「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求是》雜誌，2020年第4期）。檢索1月8日至1月20日人民日報上全部1132篇文章，沒有「肺炎」一詞。

1月21日，習近平對疫情的「重要指示」見報。

22-25日，4天，人民日報沒有一個頭版頭條和抗疫有關，及至26日發佈常委開會消息，關於疫情的新聞終於放到了頭版最重要位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在人民日報上，報頭下方的頭版頭條歷來是顯示重要性的首要空間。抗疫現已成為最重要的新聞事件。按人民日報慣例，中央號令既出，黨報聞風而動。次日頭版頭條，應非抗疫莫屬。但1月27日實際的版面，抗疫又放在「次重要」位置：



1月25日、2月3日、2月12日，中共連開3個關於抗疫的常委會議。形勢空前嚴峻。

3次常委會的報道都是頭版頭條。習近平關於抗疫的多次指示、講話、視察活動，人民日報都在頭版頭條位置報道。但就在這舉國抗疫的同一時段，正如1月27日的版面，有另一類頭版頭條：



這是2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

細看，原來這是冠名「總書記來過我們家」的系列，這個系列，全部安排在頭版頭條位置。它在元月5日第一次見報，20日前的兩周內已出現5次，21日後的一個月，出現了14次，其中2月7日到10日連續4天出現。

從版面設計角度看，這個系列長得實在醜。每篇都是一個面孔，且又如此密集地推送，彷彿刻意製造讀者的審美疲勞。更重要的是內容缺少新聞性。

它是一個「回訪」系列，記者回訪了習近平上任後到過的一些家庭（多數在貧困地區），最早的是在2012年底，最近的是在2019年9月。

「回訪」是從對舊聞的追蹤中發掘新聞的一種樣式。該系列想發掘的，是總書記曾經到過的家庭，如今都已過上小康生活。

這是不是新聞？是不是2020年1月-2月中國人民高度關注的新聞？或從人民日報的定位說，這是不是9000多萬中國共產黨黨員在這段時間最關心的新聞？

「總書記來過我們家」系列，顯然策劃已久，其大部分稿件的採寫，疫情爆發前應已完成。我在《病毒肆虐時，黨媒在忙什麼？》一文中分析，2020是「全面建成小康」的收官之年，歲尾年初要吹響衝鋒號。人民日報的這個系列，是收官之年的慶功之作，要一展「脫貧攻堅」的亮麗成績單。這若干家庭的變化有多大代表性並不重要（這些人家無疑將受到地方政府特別關照，想不致富都難）；重要的是「總書記來過」。精心組織這個系列，乃黨媒最大的政治。

問題在出街的時機，也就是語境。

從1月25日常委會議之後，人民日報上有兩個習近平：一個在親自指揮抗疫；一個在收割小康成果。

從第一次關於抗疫的常委會議之後，1月底和整個2月，都是疫情極為嚴重、節後復工問題又接踵而來的關鍵時段。大力宣傳抗疫，無疑是人民日報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人民日報是否應該拿出更多的頭版頭條，來報道這個習近平所稱的「頭等大事」？

且看若干關鍵日期發生的新聞和人民日報的版面處理：

「1.25」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該小組在常委會領導下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疫情防控。1月26日，組長李克強主持領導小組會議。這是領導小組的第一次會議，第一時間推出諸多重要決策。如果沒有習近平對抗疫的最新指示、活動等，這條新聞是毋庸置疑的頭版頭條。然而，會議次日（1.27）的人民日報，把這條消息放在頭版右側中部。

下圖是當天人民日報頭版和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湖北省委機關報湖北日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頭版的比較。領導小組會議消息以紅圈標出，江蘇、湖北把它放在頭版頭條，上海放在「報眼」，這三地黨報頭版內容全部是抗疫。人民日報則我行我素，頭條是「來過我們家」系列的《綠水青山帶來了金山銀山》，講環保促進脫貧。



人民日報這個版面的處理方式，極不恰當。領導小組是黨中央的抗疫指揮中樞，李克強是在貫徹習近平講話和常委會議精神，領導小組的決策對全國抗疫有最及時最重大的指導意義。這條新聞為什麼不放頭版頭條？

1月30日，李克強視察中國疾控中心，對查明病毒源頭、加緊疫苗研製、完善診療方案作出多項要求。這些要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民日報有責任將它安排在最重要位置。但，次日人民日報頭版，這條消息仍放在右側中部。頭條是「來過我們家」系列的《村子變美了 機會增多了》，講改革之初最早搞土地承包的小崗村，如今辦起了「農家樂」。

2月1日，李克強考察疫情防控國家重點醫療物資保障調度平台。這條消息放在右側。頭條是「來過我們家」系列的《戈壁灘上走出康莊道》，講一個生態移民家庭，小兒子新買了車，大兒子工資漲到了6000元。

2月2日，有兩條重要新聞，一是軍隊抽調1400名醫務工作者承擔武漢火神山醫院的醫療救治任務，二是李克強主持領導小組會議，加大醫療防控物資支持力度。次日人民日報，前者放在「報眼」，後者又在右側。頭版頭條是「來過我們家」系列的《挪出窮山窩 致富門路多》。那家的致富門路，是辦了個釀酒作坊。

2月3日，領導小組第三次開會，部署提高武漢湖北收治率治癒率、降低感染率、病死率措施。次日，人民日報將此條放在頭版右側，頭條是「來過我們家」系列的《老區拔窮根 發展有奔頭》，講「總書記關心廁所革命」。

2月6日，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要求有序做好恢復生產保障供應工作。這條消息在次日人民日報頭版的位置和前次一樣。頭版頭條是「來過我們家」系列的《為美好生活努力打拼》，重點是那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學。

2月13日，李克強主持了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部署進一步分類分級有效防控疫情。分類分級，關係到習近平提出的「精准施策」，極其重要，但這條消息，連同經習近平批准，軍隊增派2600名醫護人員增援武漢到消息，分量都比不上「來過我們家」系列的《最實在的獲得感》。這個頭版頭條，講「整村搬遷」。

春節後，抗疫、復工兩件大事泰山壓頂，領導小組在2月17日、20日召開第七次、第八次會議。會議次日人民日報，版面只需複製既往。18日頭版頭條是「來過我們家」系列的《村裡的變化可大了》，文中新聞點，是習近平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提到過那家主人名字。21日頭版頭條是同系列的《路通了人氣旺了》，該文涉及老百姓健康問題，引用了習近平的話「基本醫保、大病醫保、醫療救助是防止老百姓因病返貧的重要保障」。百姓健康如此重要，為什麼不把同日的抗疫報道放到頭條？

這一時段，中國各地黨報的頭版頭條，基本上都是抗疫報道，包括中央決策、本地決策和本報記者自採的新聞。1月27日至2月21日，北京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11條自採的抗疫報道。同時段，中央級黨報在頭版頭條刊發的自採抗疫報道，《中國青年報》8篇，《經濟日報》11篇，《光明日報》12篇。人民日報也派出強大的採訪隊伍到抗疫前線，1月27日到2月22日，人民日報在「來自疫情防控一線的報道」欄目和「一線抗疫群英譜」欄目中發表了百餘篇本報記者採寫的報道，然而，卻僅有一篇《衝鋒，這裡就是戰場！》刊登在2月19日頭版頭條位置。

這就是說，無論是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的各種決策、部署，還是本報記者從抗疫一線發回的報道（雖然大部分是贊歌，但許多也是冒著危險採寫），還有1月26日至2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卻從未安排在頭條的多篇本報評論員抗疫評論，都不如「總書記來過我們家」重要！

總理李克強是奉總書記之命指揮抗疫的第一責任人。人民日報對他的報道，竟然也受「潛規則」約束。1.25常委會後，李克強26日赴武漢，這是億萬人矚目的新聞事件。27日，北京日報旗下的北京晚報將這當日發生的大新聞放在頭版頭條，湖北日報28日也放了頭版頭條：



也就在李克強赴武漢當日，習近平發出抗疫指示，其關鍵內容「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准施策」，其實是重複了報紙已報道過的25日常委會精神。但有了它，它就是當仁不讓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而總理的大新聞只能屈居二條，而且他到湖北武漢考察指導，必須強調「受習近平總書記委託」：

得感」。他們把領袖腳印視為神跡，兩耳不聞百姓哭，一心專繪偉人圖。我們無法揣度總編心態，只想說，這張報紙和它背後的體制，病得不輕！

附言：文尾也想附錄一條關於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史料。這是1976年7月30日的報紙：



兩天前，剛剛發生「7.28」唐山大地震，前一日，人民日報剛剛發佈地震消息和中央抗震號召。而30日，頭版頭條竟然是一篇批判鄧小平「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長篇報道。報眼是毛語錄：「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唐山大地震發生前，毛和四人幫正在狠批鄧小平。所以，中共中央在7月28日「號召災區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和人民解放軍指戰員，認真學習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階級鬥爭為綱，深入開展批判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團結起來，向嚴重的自然災害進行鬥爭。」

在中國，政治壓倒一切，包括救萬民於水火的抗災。傳說四人幫所云「不管東震西震，不能沖淡批鄧！」正是這種醜陋政治的寫照。

本文首發於《傳媒透視》：<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2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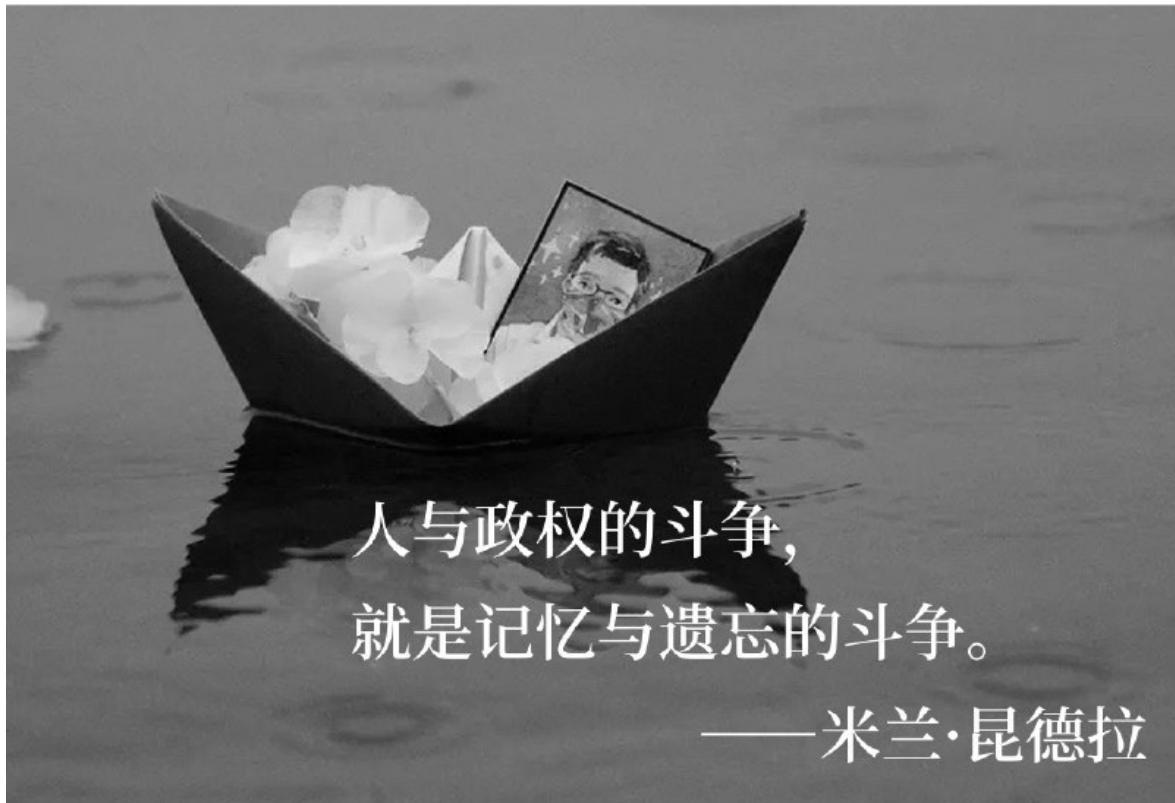
本文英文版：<http://chinamedia-project.org/2020/02/24/what-ails-the-peoples-daily/>

原文

[返回目录](#)

图集精选

[返回目录](#)



[#李文亮 #言论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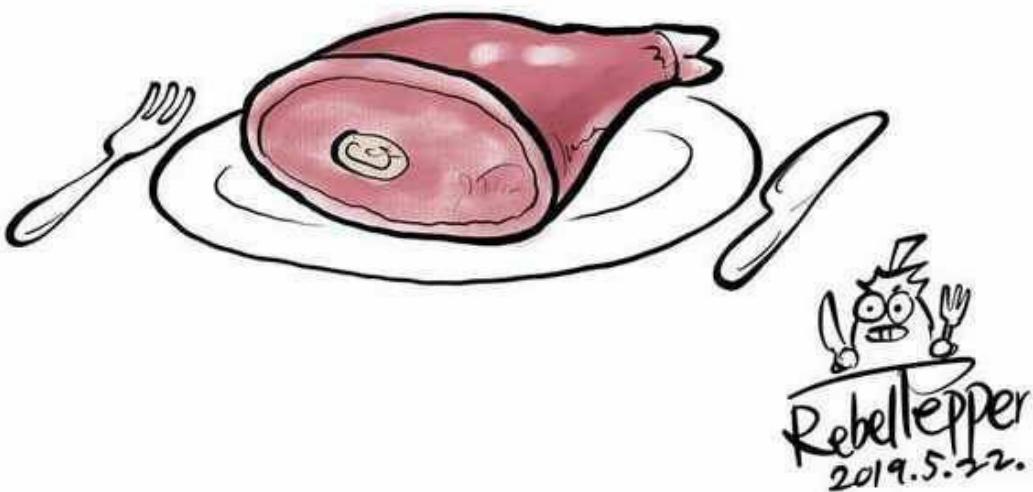
可防可控

说的

原来是我们。



#言论自由 #中国政府 #武汉肺炎



#公民参与 #民主 #自由



周峰锁 **Fengsuo Zhou** @ZhouFengSuo · 10h

荒谬至极的中共国法律判决，1996年入籍瑞典的桂敏海，著名的铜锣湾书商，2015年被从泰国绑架回中国，2018年重新被入籍中国。

桂敏海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案一审宣判

发布日期: 2020-02-24 浏览次数: 201 字号: [大 中 小]

桂敏海，男，汉族，1964年5月5日出生，原籍中国宁波，1996年加入瑞典国籍，2018年经其本人申请依法恢复中国国籍。

2020年1月，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桂敏海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于2020年2月24日公开宣判，认定桂敏海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桂敏海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

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充分保障了桂敏海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部分社会群众旁听了宣判。

中国人，你还记得么？



YouTube	2009.3
Twitter	2009.6
Facebook	2009.7
The New York Times	2012
Dropbox	2014.6
Gmail	2014.9
Instagram	2014.9
Tumblr	2016.5.25
Twitch	2018.9.17
HBO	2018.6
BBC	2018.7.22
Reddit	2018.8.11
Quora	2018.8
DeviantArt	2019.3.29
Wikipedia	2019.4.3
The Washington Post	2019.6
Know Your Meme	2019.10
Archive of Our Own	2020.2.29



侯虹斌

3-2 09:15 360安全浏览器

关于举报，很显然看得出来上面在鼓励什么，又在漠视什么。

大学里的性侵案、性骚扰案，每次举报，
出来都是一大堆证据、一串受害人，
最后的处理，大多数都是轻举轻放，无关痛痒。

举报老师或网友的言论不符合他的想法，老师被解聘，被开除。

网友的文章或微博被删、被封。

举报韩红基金会，非常重视，两天就出了彻查结果。

举报红十字会，只知道武汉上空出现了黑洞，物资全被吸走了，别的，不知道。

领导依然强调：捐赠必须通过红十字。然后它们就消失了。

我写了一段关于彩礼的微博，被举报到离开好久的单位，

大领导亲自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回事。

有人微博上反对中医，单位的院长手机被举报电话打爆，

这个社会到底在鼓励什么，又在漠视什么？

[查看翻译](#) · [编辑历史](#)



嗯。[阿默](#)

[返回目录](#)

消息精选

[返回目录](#)

大家觉得这个频道怎么样？t.me/programthinkbook

Telegram

编程随想推荐书籍（非官方）

本频道备份了编程随想所推荐过的书籍以及博文

运作方 t.me/tuozi

六四餘波：t.me/aftermath64

<https://youtu.be/Zkc-7snbFS8>

YouTube

【毋忘六四】AKB48 - 目擊者

Don't forget the Tiananmen Square bloody massacre 歌詞僅代表個人感受，公義需要得到彰顯，我們只需要做目擊者，將事件的真相傳承下去，平反六四的精神將永遠不滅，這才是真正的國民教育

<https://youtu.be/ExqqdUXXdgA>

YouTube

六四事件：廣場備忘錄－BBC News 中文 | 天安門 | 1989

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國政府動用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曾令億萬人充滿希望的政治改革戛然而止。這個震驚世界的事，如今在中國仍然是不能公開討論的話題。一場學生運動，為什麼以武力鎮壓結局？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訂閱BBC News 中文 YouTube：
[http://bit.ly/...](http://bit.ly/)

我们建了一个相关频道，旨在呼吁公民参与社会行动。欢迎大家：https://t.me/citizen_united

Telegram

行动派公民联盟

让我们用行动支持民主，自由，平等。

分享行动派信息，如：投票，捐款，搭建/使用VPN，个人信息安全。建立互相支援的公民网络。

...

[返回目录](#)